

〔阿拉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 著 宋 岷 译注

道里邦国志



華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848

〔阿拉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 著 宋 岷 译注

道里邦国志

華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里邦国志 / (阿拉伯)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
宋峴译注.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075-4608-8

I. ①道… II. ①伊… ②宋… III. ①商路-古代-
史料②阿拔斯王朝-对外贸易-史料③中外关系-古代-
史料④东西交通与驿站-史料⑤西域-史料- IV.

①K937.16 ②F753.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3784号

道里邦国志

作 者:〔阿拉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

译 注:宋 峴

策 划:杨 平

责任编辑:杨 宁 郭俊萍

特邀编辑:马良成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s.com.cn>

电子信箱:sinoculturepress@yahoo.com

电 话: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70

责任编辑 010-5833625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17.5

字 数:190千字

版 次: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4608-8

定 价:3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 言

张广达^①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阿拉伯古典地理学中的两部代表作。两书现经宋岷同志直接从阿拉伯文原著译出。我国新开拓的学术领域——阿拉伯学因而增添了极为重要的典籍，可喜可贺。

两部著作：一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一是古达玛的《税册》。两书的命名与古典阿拉伯地理学的发展有关；研究阿拉伯地理学的学者们又往往把两书列为阿拉伯古典地理学中的伊拉克学派著作。为了说明两书的命名来历，特别是为了说明两书在阿拉伯地理文献中的地位，让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从公元9到11世纪阿拉伯古典地理学的情况。

一、阿拉伯地理学的发展和两书的命名

阿拉伯地理学是在公元8世纪中叶开始产生，8、9世纪之交受到希腊、伊朗、印度的影响而蓬勃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阿拉伯人只是从

^① 张广达（1931—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后常住法国，先后在法国、瑞士、美国等国学术机构和大学兼职。主要论著有《大唐西域记校注》《海舶来天文，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历史联系的回顾》《天涯若比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等。——编者

王朝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把学术分为“旧学”和“新学”。“旧学”包括语言学、教义学、法学、史学,他们认为这些学科肇始于伍麦叶王朝时期(661—750年);“新学”包括天文学、数学、医学和哲学,他们认为这些属于精确学科,其发展始自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地理学在阿拉伯人的学科分类中被视为精确学科,因为它接近于天文学。就地理学本身而言,真正的地理知识是在阿拔斯王朝建立(750年)之后积累起来的。具体地说,是在艾布·贾法尔·曼苏尔哈里发在位时期(754—775年)、特别是在他奠都巴格达(762年)之后得到发展的。阿拉伯人征服伊朗、埃及、印度,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和获得古代文明古国的科学文化知识。曼苏尔在治国过程中极其关心把外来的科学著作译为阿拉伯文。他大力提倡的翻译事业被后人继续了二百年之久。许多翻译家本身就是著名的学者,这些译者兼学者把希腊、埃及、伊朗、印度的地理学、天文学、哲学知识引进了阿拉伯世界,从而大大丰富了阿拉伯自身发展起来的文化的內容。

在各种外来的文化中,对阿拉伯地理学影响最大的可能要数希腊人克劳丢斯·托勒密(约90—168年)和其他天文地理学家、哲学家的著作。希腊人的著作是通过中世纪叙利亚文(Syriac)的中介译本而对阿拉伯人产生影响的。许多学者认为,“地理学”(juḡhrāfiyā或jighrāfiyā或jaghrāfiyā)这个名词本来就是提尔城(Tyre,黎巴嫩南部地中海岸城市,古代的推罗城)的马里诺斯(Marinos,约70—130年)和托勒密著作的标题,阿拉伯人把它译作“大地的形象”(ṣūrat al-arḍ),有些阿拉伯地理学家便以此作为自己著作的标题。麦斯欧迪(Mas'ūdī,?—956年)把这个名词解释为“大地的区划”(qaṭ' al-arḍ),并在《雅致的信札》(Rasā'il Ikhwān al-Ṣafā')中第一次从“世界与各地图绘”的意义上使用了juḡhrāfiyā这个名词。我们这里介绍的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也说过,他参考过托勒密的著作,只是人们现在不清楚他使用的是希腊文本还是中世纪叙利亚文本。希腊地理学对阿拉伯学者影响之广泛,由此可见一斑。

伊朗传统对阿拉伯古代地理学和地图学的影响也很明显。研究穆斯林地理学的著名学者克拉默斯(J. H. Kramers)指出,在9世纪,希腊地理学的影响占绝对优势。但从9世纪末起,伊朗的影响日益增强。例如,到10世纪,尽管科学知识已经有了长足进展,但来自伊朗的某些传说仍在阿拉伯地理观念和制图学中占据着显著位置。具体说来,大地的形状被比作一只巨鸟,中国是它的头,印度是它的右翅,曷萨是它的左翅,麦加、汉志、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是它的胸腹,北非是它的尾巴^①这种传说甚至构成了公元9—11世纪阿拉伯古典地理学文献中的巴里黑学派(详见下文)的基础。有些学者认为,这种观念有可能源于阿拉伯人看到的某种古代伊朗地图(参看《伊斯兰百科全书》新版,艾哈迈德写的“地理学”条,该书卷二,莱顿,1965年,第575页)。

印度的天文学比地理学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阿拉伯地理学的发展。阿拉伯学者从印度人那里学到了天转实际是由于地转(天转地不动只是由于地球依地轴自转而使人产生天转地不动的表面印象),大地水陆各占一半,大地有如龟背、四周被水包绕,大地犹如穹窿、斯里兰卡为其顶端,大地的标准子午线始自Ujjayn等观念。

与上述受到希腊、伊朗、印度影响的自然地理学发展的同时,阿拉伯古典地理学还有另一条发展的脉络,这就是阿拉伯自己的描述地理学的发展,其来源可以追溯到比自然地理学形成更早的阿拉伯旅行者们的行记。描述地理学在它产生的初期,曾同教律学、语言学等有联系,其后又与美文学的发展有关,此外,描述地理学又和自然地理学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了一系列混合型的作品。但是,不管怎样,对于阿拉伯古典地理文献来说,由行记发展起来的描述地理学这条脉络似乎更有典型意义,更富特色。正是这条发展线索赋予阿拉伯古典地理学以特殊的风格,人们很难在其他语言文献中找到如此大量的同类撰述。阿拉伯的描述地理学作品以它们的内容之丰富、材料之驳杂而令人赞叹不已,每一个研究者

① 见伊本·法齐赫书,德·胡耶刊《阿拉伯语舆地丛刊》。

都可以从这些内容和材料中寻找各自所需要的资料。

此外，阿拉伯地理学的发展还有特殊的宗教原因：

1. 伊斯兰教重视每日五次礼拜、每年莱麦丹月斋戒，这对于促进天文—地理学的发展是有作用的。每昼夜五次礼拜的时间，斋期的开始与结束都是有严格规定的，这就要求有一定的天文学和数学知识才可以判断时辰。礼拜依据的平太阳时，取决于礼拜者对所在地点的经度有精确的认识。例如，日晷的影长每天都需要进行计算，当日晷刻度上的下午影子比中午长的时候，所谓“晡礼”的时间便到了。这时候，礼拜者的跪拜要朝向麦加的克尔白 (ka'bah)，这个方向叫“朝向” (qiblah)；一切礼拜寺的殿堂的方位和布置也要考虑“朝向”，以便使所有礼拜者叩拜时朝着麦加的方向，这样一来，遍布世界各地的清真寺虽然各依其所在地点而取向不同，但都以麦加的克而白为“朝向”中心，从而在地球上的布局好像构成了一圈一圈的同心圆。这一定向工作要求人们了解每个特定地点相对于麦加的位置。

2. 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是朝觐，这就是有一定收入的穆斯林一生中至少必须到麦加朝觐一次。阿拔斯王朝时期无论是内陆驼队贸易，还是海上交通都非常发达，这不仅沟通了王朝治下的腹里与边远地区的往来，而且使王朝的影响远及疆界之外，到达中非、东北欧、印度、中亚、东南亚和中国，从而也扩大了朝觐所涉及的世界。

3. 某些宗教信念也有助于地理活动的开展。据说，先知穆罕默德有一则圣训 (Ḥadīth) 称：“学问，即便远在中国，亦当求得之。”这条圣训也许出于后世，但它曾经促使某些信徒东来中国寻求学问。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瓦西格 (842—847 年) 为了探究《古兰经》中有关东方的几则传闻，先后派遣通事撒拉姆 (Sallām)、著名学者穆罕默德·花刺子密 (Muhammad Khwārismi, ?—850 年) 陆续东来。有些阿拉伯作家、地理学家的著作引证了他们留下的报道，这些富有浪漫色彩、夹杂了过多的荒诞故事的记述，和海上辛伯达的神奇事情一样，往往令人难以全然置信。但是，它们有助于阿拉伯地理学的发展。12 世纪，甚至远在安

达卢西亚(西班牙)的一位教法学家赛尔德·海尔·安萨里·安达卢西(Sa'd Khayr Ansārī al-Andalus, ?—1146年),得到“中国”的附名,原因据说就是因为他曾到中国游历。

由此可见,即便抛开个人志趣和学术旨趣不谈,上述社会历史背景也必然促成内容驳杂的地理学文献的产生。如上所述,阿拔斯王朝时期的阿拉伯人只是把地理学当作是最接近天文学的一门精密学问,并没有把它看作现代意义上的定义明确、范围确定、有专门内涵和特定对象的学科。因此,阿拉伯人在地理学的名称上也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字样,来自希腊语的地理学 *jughrāfiyā* 一词有时指自然地理学,有时被当作“经纬度学”或“诸城定点学”。^①一般描述地理学通常被称为“道里邦国志”,这就是我们这里介绍的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地理著作所使用的书名。

不过,阿拉伯古典地理学文献毕竟有某些共性。因此,各种主题和内容的地理学著作最后大多数以《诸国志》(*Kitāb al-Buldān*)、《大地之形象》(*Ṣūrat al-Arḍ*)、《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l-Mamālik*)、《道路纪闻》(*ʿIlm al-Ṭuruq*)等命名,名称虽异,实际不出描述地理学的范围。

促成阿拉伯地理学发展的诸多因素有如上述,强调这些因素绝不等于轻视地理学与政治的关系。阿拔斯王朝在施政过程中,在8、9世纪设置了一系列国家公务部门,特别是财政税收管理部门。为了控制和管理全国各地,为了敛取税收,以巴格达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需要维持良好的交通路线网,需要搜集各种路线里程资料,了解驿站。转运条件和物资状况。在伊朗,阿拉伯人利用了萨珊王朝库思老·阿努什尔旺(531—579年)的籍账;在埃及,利用了拜占庭官僚制度的复杂的行政程序。然后,变化了的条件要求反复核查有关省份和城镇、村落的位置、人口、农业手工业生产、课征税额等的确切资料。于是,专门的《税册》(*Kitāb*

① 这是比鲁尼的说法,参看《伊斯兰百科全书》新版,艾哈迈德写的“地理学”条,该书卷二,第575页

900
——道里邦国志

al-Kharāj) 便应运而生。它最初是官员胥吏使用的手册, 可是后来也为更广泛的人们利用起来。

不仅如此, 阿拔斯王朝是当时的世界大国, 它的国际地位使它不能只限于了解自身疆域内的情况, 它也需要具备对其他地区、首先是毗邻地区的某些准确知识。因此, 在《道里邦国志》《税册》等地理著作中也采纳了阿拔斯王朝以外国度的有关地理情况。为了获得这些情报, 和平时期的使节和战时的俘虏都是阿拉伯地理学家了解情况的对象。

二、阿拉伯古典地理学中的伊拉克派和巴里黑派

以《诸国志》《道里邦国志》为著作标题的阿拉伯地理学家往往以修订、增补前辈的同类编纂物作为自己的著作。这一批编纂家递相变前贤的著述为自己的著述, 有时连书名也沿用不变。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并不认为是剽窃攘夺。因此, 9 世纪以来的许多地理编纂物也被概括称为“道里志”派著作。

如上所述, 9 至 10 世纪是阿拉伯(穆斯林)地理文献发展史上最具特色的时期。在西部, 10 世纪虽然是哈里发帝国政治瓦解的时期, 但文化极为繁荣; 在东部, 哈里发帝国在 9、10 世纪开始瓦解, 导致几个地方王朝的出现, 而地理学就其创造性而言, 正是在萨曼王朝(874—999 年)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因此, 学术界把 9 至 10 世纪称为阿拉伯地理学的古典时期, 并根据这一时期的地理学文献的特征区分之为两个派别:

一派作品论述的对象是整个世界, 但仍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伊斯兰帝国”(Mamlakat al-Islām)。他们力求为一般伊斯兰教文献中看不到的世俗知识争取一席之地, 因此也被称作“当代世俗地理文献”。这派学者主要描述地形和“伊斯兰帝国”即阿拔斯王朝的道路系统, 同时涉及数学、天文学、物理学、人文及经济地理学。代表人物有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叶尔孤比、伊本·法齐赫、古达玛和麦斯欧迪。由于伊拉克是阿拔斯王朝立国的中心, 许多地理学家云集于巴格达等地, 故学界称此派为“伊拉

克派”。不过,这个学派的学者还可以分成两类:一类依四方(东、西、南、北)来编排材料并力求把巴格达看作是世界的中心;另一类则按各种不同的“地带”来编排材料,而且极力表彰麦加的中心地位。

另一派的叙述一般局限于伊斯兰世界,把每一个省区都描写成一个单独的“地带”,而且除边缘地带之外很少涉及非伊斯兰地区。伊斯塔赫里、伊本·豪卡勒和穆卡达西属于这一派。因为他们都追随地理学大家艾布·栽德·巴里希之后,学界把他们又称作“巴里黑派”。下面我们对两派地理学著述的特点做一点详细的介绍。

(1) 伊拉克派

本派代表人物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叶尔孤比和麦斯欧迪的著作有两大特点,这使他们有别于本派其他地理学家的撰著:第一,他们的叙述遵循伊朗人的“地区”(kishwar)体系;第二,他们以伊拉克与伊朗诸郡相提并论,但以伊拉克为阿拉伯世界中心来开始区域地理学描述。据比鲁尼——伊朗人的七个“地区”是七个相等的圆圈,中心“地区”是伊朗,它包括呼罗珊、法尔斯、杰贝勒和伊拉克。比鲁尼认为这种划分是武断的。应当看到,在巴格达被立为阿拔斯王朝的首都之后,伊拉克自然而然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在政治上占据了首要地位。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将伊拉克同伊朗诸郡和塞瓦杜地区^①相提并论,而且占据了其他地理学体系的中心位置。

与上述几位地理家相反,古达玛、伊本·鲁斯塔和伊本·法齐赫则表现出对伊拉克和伊朗沙赫尔并无热情。在他们的体系中,麦加和阿拉伯半岛被置于优先地位。在古达玛的书中,麦加被赋予绝对优先的地位,通向麦加的所有道路都被放置在巴格达辐射出来那些道路之前。固然,他也重视伊拉克,不过只是把它看作阿拔斯帝国的一个主要省份,也就是说,只是出于政治和行政的考虑。

由此可见,古达玛的地理学体系显示了一点细微的变化,这就是重心

① 这里在古代被称作“伊朗沙赫尔的心脏”(dil-i Īrānshahr)。

从伊朗观念转向了“对伊斯兰的探讨”。在伊本·鲁斯塔的书(4到10世纪初)中也能看到类似的倾向,他彻底摆脱了伊朗传统,在编排地理学资料时把麦加和麦地那断然列在首位。伊本·鲁斯塔甚至在对七种“地带”的描述中也宁可依照希腊的形式而不遵循波斯的“地区”体系。伊本·法齐赫的地理学著作也是如此,有关麦加的描述居于优先地位,不过该书的相当多的篇幅是讲法尔斯、呼罗珊等地的,因此,他对“地带”的阐述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到波斯的“地区”系统。

虽然如此,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叶尔孤比也好,古达玛的书也好,他们的共同点是编排和叙述材料所遵循的原则是依东、西、北、南把世界划分成四片地区,即所谓“四方原则”。这种描述方法应当在某些伊朗地理学传统中找到其根源,这些阿拉伯地理学家必定有某些可以模仿的先驱模式。据麦斯欧迪说,波斯人和纳巴泰人(Nabatæan,巴勒斯坦)把世界上的居住区分为四部分,即呼罗珊(东)、巴赫塔尔(Bakhtar,北)、忽尔巴朗(Khurbarān,西)和尼姆鲁兹(Nimruz,南)。然而,古达玛看出了这种划分的主观随意性。因此,对他来说,东、西、北、南这几个词只有相对的意义。

(2) 巴里黑派

这一派因艾布·栽德·艾哈迈德·本·萨赫勒·巴里希(约235/849—50—322/934年)^①而得名。巴里希生于巴里黑,主要活动在中亚地区。他年轻时在伊拉克住过八年左右,曾就学于肯迪(?—260/873—74年)门下。回故乡之前广泛游历各地,学习了多种学科,后以天文学家和哲学家知名。回乡后一直住在巴里黑,受到萨曼王朝宰相扎伊哈尼的礼遇。巴里希的后半生可能持有正统观点,他的一些论文得到正统派的很高评价。他的地理学著作名为《诸域图绘》(Şuwar al-Aqālīm),这是一部附有简志的地图汇编。然而,巴里希这部著作迄今仍然找不到单独成帙的确证,一度被归到巴里希名下的一份写本,现已证明实际出于伊斯塔赫

^① 前为伊斯兰历纪年,后为公元纪年。下同。——编者

里的手笔。看来，现在人们还只能维持德·胡耶的原来意见，即伊斯塔赫里的《诸国道里》囊括了巴里希原著的全部内容并进行了许多增补，编成于巴里希在世的 318/930 和 321/933 年间。总之，巴里希书已经失传，但世人多靠伊斯塔赫里、伊本·豪卡勒、穆卡达西等人递相增修的多份传世抄本仍可得窥原作概貌。

巴里黑派赋予阿拉伯古典地理学以正派的伊斯兰色彩。这一派作者把自己的叙述范围限制在“伊斯兰诸国度”(Bilādal-Islām)之内，对于非伊斯兰国家只是在他们的著述中略加叙述。这一派作者以《古兰经》中的说法，或者以圣训为依据。例如，他们把大地比作一只巨鸟(参看上文)，这与阿卜杜拉·本·阿慕尔·阿斯的传说是一致的；他们又说，大地呈圆形，并被“环形之海”所包围，犹如动物脖颈上的环纹，这个“环形之海”有两道“深渊”，即地中海和印度洋两者，中间因隔有障碍物(barzakh)而互不相通，隔离它们的障碍物就是古勒祖姆(al-Kulzum，今苏伊士)，显而易见，这是来自《古兰经》的观念。

与伊拉克派的某些地理学家不同，巴里黑派的这几位地理学家都把世界的中心置于阿拉伯半岛，这就是克尔白所在的麦加。巴里黑派的兴起稍晚于伊拉克派，主要是在 10 世纪。他们的本意只在描述“伊斯兰诸国度”(Bilād al-Islām)。

他们把这些国度分成二十个“地带”，他们的“省区”划分既不是根据伊朗的“地区”系统，也不是依照希腊的风土系统，而是地域性的、纯自然的。对于先前的主观区划而言，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或许还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现代化”的尝试，例如，伊本·豪卡勒说过：他没有遵循“七个地带”的模式，也许这种模式曾经是恰当的，但现在则充满了混乱，有好些“省区”界线交叠重合了。因此，他为自己的每一章都画了一幅地图以描述每一个“省区”的形势，注记边界及其地理现状。由此说来，这一派地理学家的重要贡献就是他们有了自己的系统，从而扩展了地理学的范围，使其中包括新的、更实用的、更有益的内容。

本派诸家著述抄本大多有图有志，舆图共 21 幅，这种图志体的地理

著作的图幅数、形状、次序趋于固定，因此人们通常称之为《伊斯兰方輿图》。輿图的总图是一幅圆形世界地图，上面表现了“伊斯兰诸国度”的各个不同地区以及世界上的其他非伊斯兰“国度”。该图力求运用一定的透视原理显示这些国度，表现每一个地区的相对位置和大小。但是，由于全图并没有表现各个“地带”的真正比例和形状（圆的、方的或长方形的），因而他们实际上放大了每个“地带”的面积。他们这种画法在阿拉伯制图中可能是第一次尝试，但这套最后定型的輿图毕竟是这一派的又一贡献。正确地对待这些地图并对它们的内容进行仔细的考定勘同，肯定有助于解决巴里黑派地图的起源问题。

伊斯塔赫里、伊本·豪卡勒和穆卡达西还第一次把国家概念作为地理学术语提了出来，他们划定了世界上几个主要王国的边界。

大部分阿拉伯古典地理学著作在 19 世纪即经荷兰学者德·胡耶校勘付印，结集为《阿拉伯輿地丛刊》（*Bibliotheca Geographorum Arabicorum*，简称 BGA）。书凡八卷，1879—1939 年刊于莱顿。今天，人们使用《阿拉伯輿地丛书》，应取据 1879—1939 年版影像重印版（1967 年，莱顿），在 1967 年版中伊本·豪卡勒书的德·胡耶校勘本已为克拉默斯（J. H. Kramers）校勘的另一更完整的抄本所取代，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近几十年来发现的好抄本毕竟多于德·胡耶时代。

在这里，还可以提醒注意，伊本·法齐赫的书有了 1923 年在马什哈德发现的“杂卷本”；伊斯塔赫里的书有了希尼（al-Hīni）新刊本（开罗，1961 年）。在我们还没有条件直接利用世界各地珍藏的原文抄本之前，这些刊本就是我们要备的资料。在这里，读者还可以注意，阿拉伯古典地理学著作绝大部分都有欧洲语言的译本。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古达玛二者的书在 19 世纪就有巴比耶·德·梅纳尔（C. Barbier de Meynard）和德·胡耶的法译本，伊本·豪卡勒书有克拉默斯和威特（G. Wiet）的法译本（贝鲁特与巴黎，1964 年）；穆卡达西书有米盖勒（A. Miquel）的法文节译本（大马士革，1963 年）；伊本·法齐赫书有马塞（H. Massé）的法译本（大马士革，1937 年）；雅占比的书有威特的法译本（开罗，1937 年），等等。

三、对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古达玛之评价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可以说是古典阿拉伯地理学的鼻祖，他奠定了用阿拉伯语撰写地理学文献、特别是伊拉克学派的地理著作的风格和模式。如上所述，9世纪产生了许多标有《道里邦国志》这一共同名称的作品，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很可能是第一位使用这样名称的作者。他的著作被阿拉伯古典地理学家们视为规范，受到了几乎所有利用它的地理学家的称颂。然而，正像克拉默斯所指出的，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却未必是这种体例和写作风格的首创者，在他之前，必定还有一本著作构成他遵循的模式。他身任邮驿部长官，极有可能接触了古代伊朗的钵罗婆语的地理著作的阿拉伯语译本。他的这部地理著作可能还是他写作活动中的一个偶然成果。据他自己说，这部书是应哈里发的要求而写作的，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他个人兴趣之所在。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虽然不是流传至今的描述地理学作品的第一位作者，但他的书毕竟是迄今为止单独成帙的最早的地理学著作，尽管是后来的简写本，仍然使人有可能对它进行全面的评价。

艾布·卡西姆·欧拜杜拉·本·阿卜杜拉（或作“阿赫玛”）·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约生于205/810（或211/825）年。卒年为300/912年。他的祖父的伊朗名字可以转写为 **Kh·r·da·dh·b·h**，意思既可以解释为“太阳的无上赏赐”，也可以解释为“无上太阳所创造”。这种神名形式表明他是一个波斯血统的拜火教徒（祆教徒）。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父亲在9世纪初是哈里发马蒙派驻里海南岸泰伯里斯坦的总督，建立了征服代义赖姆（Daylam）的某些独立地区的功勋。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原来也是一位拜火教徒，后归信伊斯兰教，曾在巴格达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仰赖父亲的势力，得以就学于著名的歌手和音乐家摩苏尔人伊斯哈格门下。出身决定了他的隆运：成年以后担任伊朗西部杰贝勒省邮政和驿传长官，后又升为巴格达及萨马拉的邮传部长官，这些职务使他

有可能接近哈里发穆尔台米德(256—279/870—893年),成为最有影响的陪膳者(nadīm)之一。从伊本·奈迪姆的著名的《百科津逮》(或译《百科索引》,Kitābal-Fihrist,10世纪末成书,第149页,第1—5行)片段引文可知,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著作至少有九部之多,但几乎全是涉及美文学(Adab)或描述闲情逸致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表现出明显的亲伊朗倾向,如《波斯人谱系汇编》;另一些则纯系为上流社会人士排遣百无聊赖的生活而作,如《谈饮料》《粗茶淡饭说》。今天,只有一份《忘情与消遣》的写本在一份私人文集中被找到了。他还写过一部《历史》,据麦斯欧迪说,内容是伊斯兰以前诸民族的沿革。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着手写他的《道里邦国志》大概是在他担任杰贝勒省邮驿长官的时候。开始并没有完备的资料,他边写边搜集,这显然花费了他很长的时间。据德·胡耶推断,初稿完成于232/846年左右,二稿的定型不早于272/885年。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最后定论,尽管多数学者支持德·胡耶的观点,但仍有少数人认为此书只有最后一稿。据德·胡耶的意见,两个原本都没有流传下来,坊间通行的是较晚的简本。

该书的优点是叙事简明,只要粗略翻阅一下全书,其结构便可了然。该书按照传统,从颂圣、讲述自然地理学知识(例如托勒密对大地形状的描述)开篇。我们应当注意,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提到的著作有些尚存异说。在记述不同国家朝拜方向(qiblah)的短章之后,就是对塞瓦杜(Sawād,两河流域南部)的十二郡(astān)六十县(tasuj)的罗列和叙述。作者在这里详细列举的税收资料(本书其他部分对此也有涉及)使人们有可能借此复原这一时期阿拔斯王朝的预算情况。这一节以罗列古代诸王名号为结束,诸多王号是根据波斯史料汇集起来的,上面开列了波斯、罗马、斯拉夫、突厥、中国统治者的称号。

本书的主要部分是由详略不等的对道路的记述构成的,这里第一次记载了巴格达北到中亚、南至印度的道路,作者给我们提供了有关大呼罗珊路的确切而翔实知识。

大呼罗珊路在阿梅越过乌浒水可至法腊勃，再经拜坎德过长城门至布哈拉，而后沿泽拉夫珊河左岸至撒马耳干（“王家大道”）。大呼罗珊路在咀密越过乌浒水可至石汗那、久越得健、珂咄罗等地区，另一歧路经铁门、碣石至撒马耳干。大呼罗珊路从撒马耳干以北去苏对沙那的扎敏路分两叉，左叉可至石城（今塔什干）及锡尔河下游，右叉越过锡尔河上游可至大宛（费尔干纳）。扎敏石城一路东通顿建城，一路北通白水城（今奇姆肯特），自白水城又分二叉，西通讹答刺，北进怛逻斯。从怛逻斯到中国边界热海南岸的拔塞干城的道里和沿线诸城绝大部分可以和贾耽记载的路程一一对勘。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在记述道里之同时提及行政区划和税收，有时还引用一些有关地名的诗句。他对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海路描写得比较生动，但是没有受“辛伯达航海”一类故事的影响，其中对海外和岛屿的物产倍加注意，详细叙述了取得樟脑的情节，描写了大象和犀牛，记述了爪哇国王之佞佛以及印度的种姓。作者对往西的道路写到西班牙，有关拜占庭的部分特别详细；往北的道路写到了阿塞拜疆和高加索；往东南方记载了从巴格达去麦加、麦地那和阿拉伯半岛南部的道路，并列出从巴士拉、巴格达和开罗去麦加所经过的驿站名称。这一部分最后提到了两条很重要的路线：一条是欧洲商人经苏伊士海峡和红海，或沿幼发拉底河经安提奥克前往印度和中国的路线，另一条是俄罗斯商人沿顿河和伏尔加河经里海往南的路线。不过，这一段看起来像是后来增补的。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书并未以行程路线为结束，书的末尾还有一些看来是后来零星补充的内容，如大地分野、世界奇迹和著名建筑、伊本·图伦时发现的金字塔。但是，写本到此在没有形成结尾的地方突然中断，不知是何原因。

不难看出，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著作由两种性质迥然的内容构成：一方面由枯燥无味但是非常重要的官方资料汇编，另一方面又是各种地理趣闻的汇集。全书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作者安排材料的特点是有闻必录，多多益善。无疑，正如作者引用史料时所说，他能够接触国家档案；

同时，他又从行记一类记述中引用了很多有益的资料，尤其是一些属于早期（8 世纪末、9 世纪初）的旅行路线的资料。内容的驳杂导致阿拉伯地理学家对他的评价不一，但他对后来的地理学文献毕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的这部地理著作备受古典时期的地理学家的重视：叶尔孤比、伊本·法齐赫、伊本·鲁斯塔、伊本·豪卡勒、穆卡达西、扎伊哈尼、麦斯欧迪吸收了他的第三个最好的写本的内容。他的知名度后来也没有减弱：伊德里斯和伊本·赫勒敦（1332—1406 年）熟悉他的著作；波斯的地理学家们从早期的《世界境域志》的佚名作者，到晚期的哈姆达拉·可疾维尼、米尔洪德与洪德米尔也都时时加以引用。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本人并未建立任何学派，学界从分析研究的角度出发，认为他的《道里邦国志》是开伊拉克派之先河的著作。无论如何，他收集的材料构成了后来许多人著述的基础。

在欧洲，早在 19 世纪初人们就注意到了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著作，俄国人注意的重点主要是与俄国商人有关的记载。本书虽然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将伊拉克置于穆斯林世界中心位置，但作为当时哈里发王朝重要的省份，呼罗珊、法尔斯、杰贝勒和中亚仍占了很大的篇幅。近年来，我国治西北史地的学者已经注意到并且开始利用本书。这实际只是一个开端，人们还可以更深入地发掘其史料的使用价值。

《税册》的作者艾布·法尔吉·古达玛·本·贾法尔是阿拉米人，出生于巴士拉一个基督徒官吏家庭。由于接近宫廷，他本人听从当时的哈里发穆克泰菲（289—295/902—908 年在位）的要求归信伊斯兰教，这为他铺平了担任高级职务的道路。古达玛的生年不明，可能的生年早在 260/873—874 年，当伊本·弗拉特任宰相时，他于 297/909—910 年主持了监察部门。他的卒年有三种说法，即穆尔台迪德在位（892—902）期间，或 328/939、940，或 337/948 年，通常认为他死于 300 年之后不久或 310 年的说法是不确实的。

德·胡耶把古达玛的《税册》的摘要作为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书的附录加以刊布的做法是有道理的，因为两人的经历和两书的性质确实多